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嘛是天津味儿

谭汝为 留住方言就是留住乡愁

记者 田莹

天津话是城市名片 也是津派文化根脉

过去,谭汝为时常通过电视、广播系列节目和报纸专栏讲述天津的历史人文故事;如今,年过八旬的他走到手机屏幕前,在《天津日报》视频号里娓娓道来,继续传播自己研究、热爱了一辈子的津派文化与天津方言。

谭汝为祖籍广东新会,出生在天津。早年间,他的父母北上来天津谋生,落户于市中心一条名叫“耀华里”的胡同。那里聚居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住户,长辈们各有乡音,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却都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地道的天津话。好像也没人教,自然而然就能脱口而出。这段年少经历,让谭汝为很早就感受到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独特的语言魅力。

谭汝为常说,天津话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,是津派文化鲜活的根脉。一句乡音,便是天津人自带的身份印记,无论走多远,开口便能认出同乡。正如他在《乡音识烟火》中所言:“读懂天津话,不只是记住独特的口音,更要顺着方言去触摸城市历史,读懂天津卫的缘起、方言的流变与老地名承载的往事。”

几十年中,谭汝为的研究从未拘囿于象牙塔内,而是聚焦普通天津人关心的方言俗语、街巷地名、市井民俗,因此研究成果很容易拨动天津父老的心弦,唤起情感共鸣。

天津话独有的幽默感从何而来?天津的街巷地名中藏着哪些被遗忘的城市记忆?方言与地名承载的城市文脉,当下该如何守护与传承?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对话谭汝为,听他细说天津方言里的人情世故,解读地名深处沉淀的浓浓乡愁。



谭汝为

1945年出生,天津人,原籍广东新会,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授。主持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,主编《天津方言词典》,著有《天津地名文化通论》等津派文化研究著述。

幽默只是外在 从容才是内核

天津方言使用频率最高的口语词是“嘛”。它不同于疑问代词“什么”“啥”和“咋”,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。天津人口语中的“嘛”,能体现语义语境、感情色彩迥然不同的多种情态。同样是“嘛”,可以是不耐烦的“嘛呀”,可以是惊讶的“嘛玩意儿”,可以是亲热的“干嘛呢”,也可以是略带嘲讽的“这算嘛呀”。在谭汝为看来,司空见惯的“嘛”字背后,却蕴藏着天津方言的文化根脉。

谭汝为把天津话的特点概括为八个字:质朴、简洁、生动、幽默。想当年,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漕运码头,河海交汇,舟楫往来,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里交易谋生,五湖四海的移民在这里扎根落脚,各地口音、多元风俗在这里碰撞交融,再加上相声、快板这类市井文艺长年的浸润,逐渐孕育出这座商埠都市豪爽通透、乐观豁达的性格。

很多人一提天津味儿,就会想到“哏儿”,觉得天津人爱开玩笑、喜欢调侃。谭汝为却说:“天津话中最活跃的要素的确是幽默。但幽默只是外在表现,内核则是这座移民商埠沉淀下来的市民气质:热情诚恳,乐于助人,具有宽阔的胸襟和难得的淡然和从容。”

天津人的幽默不是尖刻、耍贫,更多的是豁达、开朗,善于在逆境中自我化解。谭汝为举例说,风雪交加,天津人在上班路上突然滑倒,但从不怨天怨地,垂头丧气,一句“哈哈,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儿”的自嘲,便化解了尴尬的窘态。这正是天津人幽默情怀的体现,从不跟自己个儿较劲,跌倒了爬起来,哈哈一笑接着往前走,这才是正道。

谭汝为说,天津人说话讲究干脆利索,能一个字说清,绝不拖成两个字。事情办糟了叫“砸啦”,交情过硬叫“铁啦”,分道扬镳叫“掰啦”,旗开得胜叫“盖啦”,事业兴旺叫“火啦”,计划泡汤叫“凉啦”,丢人现眼叫“栽啦”……天津话语气助词“啦”,其实是“了”和“啊”的合音,比单说“了”语气更重、感情色彩更浓。用“啦”字收尾,掷地有声,把天津人爽朗的性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所谓天津味儿,还体现在天津人说话不喜欢循规蹈矩,而乐于别出心裁。谭汝为分析说:“天津商业起步早,商贸往来频繁,交易不断,久而久之,口语表达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。像‘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’,到了天津人嘴里就变成了‘你走你的中山路,我钻我的耳朵眼儿’。中山路始建于1903年,初名大经路,建成时路宽30多米,是一条新式大马路;而耳朵眼儿胡同最窄处不到两米,是全市最窄的胡同。宽窄悬殊,亦庄亦谐,顺势现挂,彰显机敏和幽默。”

天津味儿,还藏在天津方言特有的“半截子话”里。天津人日常交际,在邻居或同事找自己借件小工具时,常说“拿你的”“用你的”——这话看似只说了一半,但背后却隐含着不言自明的潜台词:没说的,不成问题,小事一桩,不足挂齿。但外地朋友听后容易误会,以为对方是斤斤计较、舍不得借。谭汝为说:“其实,这种简洁明快的表达昭示出直率和大度,恰是天津方言妙处之所在。只有熟悉这种个性化的语境和语义,才能品出这份热络和豪爽。”

组团田野调查 为天津话寻根

老城区拆迁,再加上普通话普及,使得地道的老天津话迅速萎缩。“很多中青年人听得懂方言,口音也没问题,却搞不懂、说不出那些代代相传的老词儿。若再过二三十年,可能这些语言财富就会随老年人的离世而消散。”城市变迁造成方言流失,让谭汝为产生了一种亟须进行抢救性保护的紧迫感。

“天津话是个方言岛。”谭汝为解释,“天津旧城四周被静海话、武清话包围,唯独城里自成一体,语音、词汇跟周边不一样,就像大海里的一座孤岛。”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,最初是由天津社会史学者李世瑜先生提出的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李世瑜前往安徽,对天津方言做初步的寻根调查。在南下的火车上,两个小伙子发生争执,你一句我一句,听口音像天津人,李世瑜便上去劝解:“都是天津人,河不亲水亲,出门在外,别伤了和气。”结果那俩人同时瞪眼:“谁说我们是天津人?我们是固镇的!”
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李世瑜改变行程,在固镇下车。没想到,在路边茶摊歇脚时的几句随口交流,他又被误认为是本地人。这段际遇,再加上调研考证,让李世瑜意识到:天津话的根源很可能就在皖北一带。

谭汝为与李世瑜结识于市规划局组织的一次地名研讨会上。李世瑜送给谭汝为一批资料,并嘱托他做好两件事:一是把天津母方言皖北方言区的四界范围调查清楚;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编写一部《天津方言词典》。

为完成前辈学者的嘱托,也为解开自己的疑惑,谭汝为向天津市政协文史委提出进行天津方言寻根调查的建议,获得全力支持。2010年和2011年,专家团队先后两次深入安徽北部十余座城市,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田野调查。

“我们跑了宿州、蚌埠、固镇、凤阳、蒙城、灵璧等地,跟当地老人座谈、记音、做问卷调查,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”谭汝为说,调查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——固镇、宿州、蒙城一带的方言,跟天津话有着惊人的相似。“比如,固镇人把鲤鱼叫‘鲤鱼拐子’,天津人干脆就叫‘拐子’;两地都把油条叫‘馃子’;把红薯叫‘山芋’。还有‘腻歪’‘幺蛾子’‘起哄架秧子’‘垫巴垫巴’,这些固镇人脱口而出的话,天津人也经常挂在嘴边。安徽农村办红白事,要请专门操持的‘能人’,民间称‘大了’,也和天津一样,这些词绝不是偶然相似。”

经过反复论证,专家团队得出结论: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来自皖北方言区,以固镇、宿州、蒙城三角区域为中心,其四界范围大致是:江苏省徐州市以南,安徽省淮南市以北,涡阳县以东,“五泗灵”(五河县、泗县、灵璧县)以西。谭汝为说:“这个地域范围,在明清两朝都属于凤阳府辖区。明初燕王扫北时,安徽宿州一带的大批军士带着家属来到天津一带,实行军事建制,形成相对牢固的‘语音社团’。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,逐渐就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。”这一结论,为天津话找到了失落六百年的“娘家”,也印证了李世瑜当年的判断。

方言语音建档 留住原味乡音

2014年,谭汝为主编的《天津方言词典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词典编纂历时四载,由谭汝为执笔,经多名学者反复修订,全书60万字,收录方言词语、俗谚、歇后语、民俗文化词语7500多条,其中有三成词条属于濒临失传的老派方言,很多词语只存活在老一辈人的口头。这部著作被学界称为“天津方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”。

“编纂词典,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方言‘有音无字’。”谭汝为说。很多天津口语读音家喻户晓,书面写法却五花八门。比如形容梳妆打扮的“d á ochi”,民间衍生出“刀尺”“倒扯”等十数种异形写法,编者经过多方比对斟酌,最终选定“捯饬”。形容人胡搅蛮缠、爱挑事端的“zh é li”,同样存在多种写法,几经研讨敲定用字“折理”,但也列举了“折烈”“褶裂”“遮理”等另外几种写法。

《天津方言词典》又推出了语音版,将天津方言词语和例句的语音准确地录制下来。读者在查阅书面词条的同时,用点读笔可以听到语音。这项工作留下了珍贵的“方言化石”。

同年,天津市档案馆启动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,谭汝为担任专家组组长。该项工程招募方言发音人,要求年龄在50岁到75岁、生于天津、没在外地长期居住过、能说地道天津话。招募现场异常火爆,最后遴选出65名发音人。

录音录像的文本包括两大块:一是词条,从《天津方言词典》中精选典型词语700多条、俗谚和歇后语各200条;二是语料,将民国时期出版的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及天津各片区的买卖杂字、市井吆喝叫卖,以天津方言为载体的天津快板、天津时调、歌谣、儿歌、民间传说、谚语、歇后语、劳动号子等,以及冯骥才、林希、肖克凡等创作的津派小说典型片段,分门别类进行录制。

专家组又精心设计了家庭成员、大杂院邻居、社交场合、商务活动、节庆民俗等不同场景,安排发音人按文本演绎原生态对话,鲜活地呈现出充满生活情趣的津派民俗文化。整个录制过程使谭汝为感慨良多,他说:“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留存下来的,不只是原汁原味的乡音,更是百姓心底那份沉甸甸的乡情和乡愁。”

街区可以更新 地名仍应延续

谭汝为常说:“地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。”在他看来,天津这座城市六百多年的历史,不仅写在方志里,也沉淀在区片、街巷的地名里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,谭汝为在专攻汉语修辞学时,就曾发表过关于“地名双关、地名妙用、地名探源”的多篇论文。在他看来,地名命名是修辞学里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。但那时,他还没把地名文化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。直到2000年,离天津建城600年纪念日(2004年12月23日)越来越近,谭汝为在报纸上开设了“天津地名漫话”“天津卫老胡同”“天津地名考”等栏目,撰写了几百篇系列文章,把尘封已久的街巷掌故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他在文章中谈到,天津地名的显著特点是“水气重”。天津早期名称是直沽寨、海津镇和天津卫,不管地名怎样演变,“沽”“海”“津”三个字里都有“水”。海河水系包括大小河流300多条,天津老城内外遍布坑、塘、洼、淀,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烙印——以“沽”为名的聚落有上百个,例如塘沽、大沽、汉沽、葛沽、西沽、大直沽等;以“港”“泊”“洼”“淀”“沟”“塘”“湾”“滩”等为地名的更是不胜枚举,如大港、双港、团泊洼、南淀、茶淀、陈家沟、唐家湾、柳滩等。而“台”“坨”“头”这类字形,其实也与水相关,芦台、八里台、王庆坨、西堤头,一个个地名背后,是天津地势低洼、人们只能择高台而居的漫长历史。

他还专门研究天津地名的方言读音。铃铛阁系天津卫三宗宝之一,这个“阁”字在老城里读“g ǎ o”,但出了老城里就念“g é ”。一个地名读音,隐约勾勒出天津方言岛的边界。

在众多天津地名里,谭汝为最偏爱杨柳青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出自《诗经》,“杨柳青青江水平”是刘禹锡的诗句,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是柳永的名句。在他看来,这个地名洋溢着盎然的诗意,色彩鲜明,画面感生动鲜活,是国内为数不多既与古镇实体吻合,又和古典文学呼应的珍贵地名。杨柳青古名叫“流口”,后称“柳口”,运河两岸杨柳成荫,才演化出这个雅致的地名。

天津街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全国各省市的名字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。1946年收回租界地,洋地名一律废除,代之以各省市地名,其中不少路名更镌刻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印记。谭汝为介绍说:“多伦,记录着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激战;台儿庄,是正面战场大捷之地;独山,见证了阻击日军进犯大西南的战斗;芷江,是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的所在地。这一切都是烽火岁月留在城市中的历史见证。”

随着城市更新,很多老地名已不复存在。谭汝为统计过,天津老城里原有300多条胡同,改造后,胡同几乎踪迹皆无,为此他提出保护理念——继续使用老地名,以赓续津派文脉。“这一理念被不断具象化,比如天津轨道交通的直沽、大寺、白庙、咸水沽、李七庄、王兰庄、梨园头、东局子这些站名,都是在强化其所在位置的历史信息。”谭汝为说,这些老地名在现实城市中获得了新生,其独有的文化、历史得以延续,为我们的城市留存了更多的历史记忆和乡情乡愁。

(图片由谭汝为提供)

讲述

罗伟章推出最新力作《四千里》

抗战时期“动物西迁”的隐秘往事

口述 罗伟章 整理 何玉新

10月17日,“烽火四千里,文脉向蜀川——罗伟章长篇小说《四千里》新书发布会”在成都举办。本书作者、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,评论家李明泉等出席活动,围绕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、文学价值展开交流。

《四千里》是罗伟章的最新力作,以一段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,讲述抗日战争时期,南京沦陷前,中央大学农学院王酉亭等人,为留下畜牧业的火种,带上一千多只进口畜禽出发,行程四千里抵达重庆,展现了普通人对家国责任的坚守。罗伟章讲述了创作这部小说前前后后的故事。

一则“动物西迁”旧闻 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

十几年前,我创作表现重庆大轰炸的小说《太阳底下》时,曾查阅抗战史料,走访当年的亲历者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看到一则旧闻,说南京陷落前夕,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与十多名职工一起,保护着农学院用于教学、科研、技术推广的上千只进口畜禽,包括牛、马、羊、猪、兔、鸭等,撤离南京,跨越五个省份,历时一年,行程四千里,转移至大后方重庆。他们那支队伍被称为“动物大军”。这段旧闻使我受到强烈震撼,在日记中写下:关于这件事,我应该写一部小说。

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埋在我心里。2022年的一天,韩敬群老师打来电话,邀我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,取材宜宾李庄,那里曾大师云集,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。不久后,文学评论家陈东捷老师又跟我提起这件事。我心里那个埋藏多年的念头被激活了,我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韩敬群老师听完很兴奋,说这个角度好,让我从容地写,他有足够的耐心。

关于那场西迁,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非常少,有一篇报道,《四千里路霜晨月》,作者黄志毅,采访了王酉亭的后人,谈到王酉亭在迁徙途中遇到过土匪、杀过牲口犒赏抗日军队。但那篇报道并没有展开陈述。我想,我可以把故事补充完整。

我联系了王酉亭之子王德先生。他家住南京,因身体原因不方便见面,只是在电话里给我讲了那篇报道中写到的事。但是我依然去了南京,想看看那里的长江,尽管先前去过多次。我隐约觉得,长江的气息、体态和流响,能引领我穿透过往,倾听历史。

王酉亭带领“动物大军”走过的那些地方,此前我大多去过,尤其是大别山区,与我老家大巴山区相邻,可以说同根同源。我也需要了解抗战大局和二战全景,因此读了很多书。我觉得,那支队伍和我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,我因他们而存在,反过来也一样,他们中的每一个人,也包括动物,都与我有着共同的祖先。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吸,感受到他们勃发的生命。

为什么要护送畜禽 国难当头必须行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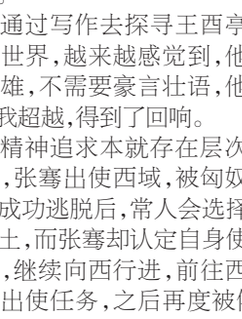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想清楚,就是王酉亭等人的动机。他们本不必承担这项任务,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期前往重庆推进迁校工作,撤离前他作出指示,这批畜禽可以宰杀、变卖、食用,底线是不能落入日军手中。王酉亭完全可以就地处置这批畜禽,这更合乎现实。学校也为他们购买了撤离的船票,但他们选择了护送畜禽西迁。单从物质层面来看,我们有理由怀疑王酉亭等人做这件事的意义——上千只进口畜禽当然重要,但在强敌入侵的局势下,又能重要到什么程度?何况,此前已经每样优选一对,带到大后方了。

在我看来,他们最初只是遵从良知,遵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,因为国难当头,必须有所行动,必须做些什么。恰恰是在翻山越岭、跨沟绕涧、风餐露宿、胆战心惊的西迁行动中,他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知,才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,并且越走越坚定。

帮助他们成长的,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与他们同时在这片国土上“移动”的,有众多流亡的师生,大家弦歌不辍,志向不灭,休息时就在路边读书上课,大雨后表演抗战剧目。还有许许多多难民,在背井离乡的逃难途中,共同的命运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同胞,什么是大义,什么是同仇敌忾,于是由难民变成了国民,由零散的国民变成凝聚起来的力量。这段历史彰显了英雄主义、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。

当我通过写作去探寻王酉亭等人的内心世界,越来越感觉到,他们是一群英雄,不需要豪言壮语,他们完成了自我超越,得到了回响。

人的精神追求本就存在层次差别。比如,张骞出使西域,被匈奴扣留十年。成功逃脱后,常人会选择即刻返回故土,而张骞却认定自身使命尚未完成,继续向西行进,前往西域诸国完成出使任务,之后再度被俘。



《四千里》封面

他舍弃个人思乡之情,放下安稳生活,承担国家赋予的任务。这份抉择,是多数普通人难以理解的。

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之下,作为普通民众、知识分子,应当如何履行责任义务,如何理解个体生命的价值?使命感并非对人的基本要求,而正是一代代这样的先辈,构筑起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,为后世文明提供了精神底气。我们的民族需要完整的精神骨架,个体同样需要建立自身的精神骨架,以此支撑整个人生。

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,天津的文学评论家任芙康老师给我发来一段视频,讲的是抗战期间,美籍华裔李灵爱变卖祖母的首饰筹集资金,购买柯达克罗姆16毫米彩色胶片,请战地记者雷伊·斯科特到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,自南而北,记录下中国人共赴国难的宏大画卷,片名就叫《苦干——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》。作家赛珍珠看过这部纪录片后说:“这才是真正的中国。”很多美国青年受到感召,报名参加“飞虎队”,奔赴中国战场。

心是作家要去的第一站 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

在《四千里》这部小说中,除了王酉亭有明确的历史原型,迁徙队伍中的其余人物都是我虚构的。迁徙路线是真实的,但过程难以恢复原貌。小说的首要任务是作用于心,心是作家要去的第一站。有时候,当我写出某个动人的细节,觉得那并不是我虚构和想象的功劳,而是在我心里埋了十多年的那粒种子,自己长成了树。

我还虚构了江月英这个人物,是这段四千里往事的记忆传承者。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证言,将发生在八十多年前、已经逐渐被人淡忘的往事,直接和当代连接在一起,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。

这部小说我改了很多遍。文字真是奇妙,某个词语、某个标点,改与不改,本是无所谓的,可我就是觉得改了才准确、才熨帖,否则便如鲠在喉,哪怕半夜想起,也要爬起来处理了才踏实。而过些天,可能又改回了原样。等到好多段落差不多能背诵了,发誓不再改了,我才眼睛一闭,交稿。可能很多作家都和我一样吧。

一部作品的诞生有机遇,也需要外力推动。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和韩敬群老师反复沟通打磨框架,他给予我充分的宽容与鼓励,从不催稿。书稿完成交出后,他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,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,并非敷衍客套。来自资深编辑的肯定,让我对这部作品更有底气。

对于书名,我曾拟定另外一个偏向抒情、类似散文题目的备选,叫《蹄声里的中国》。但韩敬群老师认为,这个名字承载不起整部作品的厚重分量。最终,《四千里》这一书名被确定下来:一方面,它准确记录了“动物大军”跋涉四千里的客观史实;另一方面,在中文语境里,“四”自带厚重、有力的质感,比如一年四季、四平八稳、四海为家……相比其他数字,“四”更具穿透力,更有韧劲,与这部小说的整体气息相互呼应。这也是我对这个书名十分满意的原因。

通过《四千里》的写作,我以“动物大军”为眼,看到了历史中一个真正的中国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可歌可泣的人民。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——总会留下遗憾,可遗憾在哪儿,又并不明晰,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,我本来是要写成某个样子的,却没能实现。对一个写作者而言,这种感觉真是令人丧气。但也有好处,就是督促我继续写下去,争取下一部写得更好。